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著作

韩康信人类学文选

HAN Kangxin

Renleixue Wenxuan

韩康信 著



科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著作

韩康信人类学文选

韩康信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文选选录作者的一部分人类学论文,其中有河南、山东、江苏、福建、甘肃、青海等地新石器、铜器及铁器时代墓地出土人类遗骸的骨骼人类学研究报告,几篇综述分析论文。研究重点是用生物测量学方法评估中国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探索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人群之间的种族关系及历史背景,还包括古墓地人口的性别及死亡年龄分布特点,骨骼的病理创伤和某些特殊风俗的考察记录。

本书对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学、古病理与古人口学及民俗史学的研究人员都是非常有益的参考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康信人类学文选/韩康信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03-053103-2

I. ①韩… II. ①韩… III. ①人类学—文集 IV. ①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6191 号

责任编辑:谭宏宇

责任印制:韩 芳 / 封面设计:殷 靓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0 3/4 插页:3

字数:698 000

定价:2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2011 年在台南三抱竹考古工作站



2011 年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所副所长臧振华、研究员李匡梯在一起



2002 年在新竹清华大学讲课



1998 年与日本学者真锅义孝（右 1）及学生在青海考察



1998 年在广西邕宁整理顶蛳山人骨材料



1997 年在香港马湾岛发掘工地



1999 年研究和复原马湾岛人骨



90 年代以来多次访问日本并参加日本土井浜遗址博物馆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1990 年与日本著名人类学家山口敏在一起



1995 年与日本土井滨遗址博物馆馆长松下孝幸和山东考古所研究员罗勋章在一起



1993 年赴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皮特·布朗 (Peter Brown) 教授在一起





1996 年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 (Victor H. Mair) 教授邀请参加“中亚东部古代民族和文化”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做了“新疆古代种族研究”的报告。图为和与会者在一起



1996 年参加“中亚东部古代民族和文化”国际研讨会，会后赴华盛顿和纽约参观。图为在华盛顿参观史密森研究院

我的人类学学术生涯

自序

录入本文选的论文(或报告)是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成果。研究对象是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考古墓地出土的人类骨骼,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人骨形态学和测量学密不可分。这是一门比较冷僻的学科,但要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长期以来这门学科并不太受到重视,但作为与田野考古密切相关的基础研究、特别是面对考古遗址出土大量古代人类遗骸的现实,这种研究绝对是不应缺少的。

对古代人骨的鉴定和研究可能提供某些重要的人类本身及社会行为方面的信息。如对新石器及以晚时代人骨的种族形态变异方向的调查,可了解现代各民族的种族属性及其来源;对古代(特别是大型完整的)墓地出土的人骨做系统的性别年龄鉴定,则可对古代居民的寿命、死亡年龄的分布乃至婚姻以及家族或氏族生活的某些规则和制度进行合理的推测;对骨骼病理及营养状况的考察不仅能提供某些重要的古代疾病及其特征方面的资料,而且可以推测这些疾病对古代人类健康的危害和对社会的影响;从古代居民骨骼上鉴别出某些异常变形和损伤,这可与史前居民某些特殊习俗联系起来。对骨骼上常出现的各种创伤的观测也可了解史前人类致伤的原因。

我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纯属偶然。1957年中学毕业本想学医,无意中看到一份有关人类学专业的介绍,说这个专业与医学关系密切、又高于医学,于是把第一志愿改成人类学。原想只有10个名额可能考不上,结果被录取了,就这样我走进了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就是体质人类学专业。在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的今天大家都知道,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综合性大学里都设有人类学系,其下一般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专业。这些专业虽都与“人”有关,但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有所不同。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乃至更早),在我国的浙江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也曾设立有人类学系但在后来进行的院系调整中都被取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科学教育方面全盘学习苏联,把体质人类学放到生物系、把考古学放到历史系等做法都与此有关。

当时复旦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人类学教研室主任是堪称中国体质人类学开山泰斗的吴定良先生,他留学英国和瑞士获得人类学和统计学博士学位,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一些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所,吴汝康和颜闾都曾在其手下工作过。1946年在浙江大学创建了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并在1948年当选为原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校期间除学习理科的基础课程外,也学习了人体解剖学、古人类学、人种学、人体形态学、人体测量学、统计学、民族志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等,期间还到杭州和北京周口店做地质和田野发掘实习。1962年毕业,与其他三位同窗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当时我所在的古人类研究室的主任是闻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先生,具体指导和管理我们的是研究室副主任吴汝康先生。吴先生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贵州大学从事人类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1946至1949年赴美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学习,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先在大连医学院任教,1956年正式调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对新进所的年轻人要求很严,一方面抓外语(当时我们都学俄语)学习,给我们指定俄语专业书进行翻译训练,还要求自学英语。此外要求识别各种动物化石、学习化石修理技术和制作资料卡片等。这一阶段的培训、特别是俄语专业书籍的翻译对我后来研究新疆的人骨材料助益匪浅。

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十一年间,虽经历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不少宝贵的时光,但在科研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的收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1970~1973年三次赴湖北西部山区考察,追踪并找到了广西以外的巨猿化石产地,摸清了它们生存的地质时代并找到了与其共生的早期人类化石;二是1968年在当时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所革委会指令我负责1966年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的研究。化石是在裴文中主持发掘下发现的,包括1件几乎完整的额骨,连有部分顶骨、左侧蝶骨大翼的上缘以及鼻根部和1件颅骨由枕鳞的右半及与其相连的部分顶骨所组成。两件头骨骨片出自同一自然层,相距不到1m,从其大小和粗壮程度看二者应该同属一个个体。因为历史原因,当时裴文中已被剥夺了研究权,但他提示我们去找20世纪30年代与这2件头骨骨片相距不远同一层位发现的2块称作5号头骨的骨片,结果证明这4件头骨骨片同属一个个体,将它们拼接在一起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北京猿人第6个头盖骨。

1972年国家文物局在故宫武英殿举办了全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文物展,这个展览实际上是后来出国展的一个预展。当时古脊椎所派我去参展,参展的主要文物就是上述北京猿人的第6个头盖骨。参加这个展览的人员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和文博单位,他们对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方面的情况都比较陌生,要我介绍一些有关方面的知识。在我做了一些介绍后,他们都说以后发现了人骨就找我,这为我后来的研究扩展了材料的来源,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来自考古所以外的单位。在此回顾我的研究生涯之际,我要对考古所野外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单位和个人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197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颜闾先生病逝,1973年我被调入该所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后返聘4年)。颜闾先生1934年毕业于华西大学医牙学院,20世纪40年代也在吴定良手下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授教于四川成都华西医学院,1957年调至北京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后于1960年又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新石器时代及其后的人骨研究直到逝世。

通过几十年来对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考古遗址出土的大量人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根据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我认为把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居民视为不同种族类型的结论是不妥当的。

二、通过对安阳殷墟中小墓和祭祀坑人骨的研究,我认为殷商时期的人民以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为主要成分,还包括北亚类和南亚类。与殷商居民中包含三大人种五个类型的看法不同;另外,在对甘肃、青海人骨的研究中发现藏族、至少其东藏人民的骨骼类型与青海青铜时代人群之间有密切关系,这与藏族成分同印欧人种关系密切的看法有所不同。

三、通过对山东地区周、汉代人骨与日本西部弥生时代人骨的比较,我认为二者皆可归入东亚类群而它们与日本绳文人之间差异明显。推测日本弥生人有中国大陆沿海的种族背景。

四、通过对新疆和黄河流域大量古代人骨的种族调查发现,两者在古代种族背景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至少在秦、汉以前新疆境内的西方人种成分较多,东方人种成分相对较少和零散。西方人种中也非单一来源,至少有古欧洲和地中海东支两类。

五、对西北地区古人骨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新石器或青铜器时代,已存在东亚和北亚类型的居民,之后二者有差异“模糊”或混合的现象。在长江以南发现的古代人类的遗骸虽较少,但多少能看出带有某些类似南亚类型的特点。

六、根据一些地区发现的“人为拔牙”方面的研究,了解到中国境内的古代拔牙风俗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且随着时代有向不同方向流动的现象、直到残留在个别现代少数民族中。

七、对部分古墓地的人骨进行了古病理和创伤的调查,这些调查包括:口腔疾病、脊椎骨退行性病变、关节病、眼窝筛等。在宁夏和新疆的古人骨中各发现1例多发性骨髓瘤病变的样本。

八、在青海、山东等多处遗址中发现了古老的钻孔术。其中一类为治疗性的开颅手术,另一类是生者为辟邪而从死者头部截取骨片,可称之为辟邪术。其时代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本文选共录入25篇论文(或报告),均为本文选作者第一署名者。文集后附有全部著作目录,如有需要可从中查找。此文选出版得到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资助,在此特别要感谢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和谭婧泽博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韩康信

2016年5月18日于北京

目录 | Contents

我的人类学学术生涯(自序)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研究	1
中国夏、商、周时期人骨种族特征之研究	37
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西方人种成分	59
仰韶新石器时代人类学材料种系特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85
安阳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研究	102
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	133
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其种族源	155
中国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拔牙习俗研究	166
中国和日本古代仪式拔牙的比较研究	181
青海民和阳山墓地人骨	199
龙虬庄遗址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	215
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	237
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	247
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古墓地人骨研究	267
陕西凤翔南郊唐代墓葬人骨的鉴定与研究	290
西乡县何家湾仰韶文化居民头骨	304
李家崖墓葬出土人骨鉴定报告	314
陕西神木新华古代墓地人骨的鉴定	329
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墓人骨鉴定报告	345
北周孝陵人骨的鉴定	377

甘肃永昌沙井文化人骨种属研究	385
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人骨鉴定	402
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人骨的鉴定报告	419
广饶古墓地出土人类学材料的观察与研究	440
山东临淄周一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	455
主要学术成果	475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研究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从人类种族衍生的角度来看,十三亿人口中除少数边缘省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具有某些非蒙古人种成分的因素外,绝大多数属于蒙古人种支系的不同地域变异类型。这种情况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他们各自在形成近代概念的中国人的起源和组成中占有何种地位?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继人类起源问题之后的另一个问题的一部分,即近代种族的起源和发展研究。本来,这些问题并不单指某个国家或某个有限地区的,种族(人种)的发生和演变是属于世界性的现象。但要阐明这个问题,又必须依靠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学者对各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学材料进行不懈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早期人类起源问题更为复杂和困难。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有其特殊的条件,即有丰富的从地下出土的人类学材料。从时代的连续性来讲,除了已经发现体质发展上处在不同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外,还在不同地区考古发掘出成批的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期的人骨材料,对这些材料的研究越来越说明,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大陆是蒙古人种发祥和演变的重要地区。因此,在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同时,解决中国境内的种族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起源和分化及其后来的扩张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是探索和证明这个问题最重要和直接的环节。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将在《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卷》里叙述。在本章中,只就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土人骨资料的研究作扼要的记述和讨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族与这个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之间存在着种族系统学上的联系,尤其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材料中,已经出现某些可以感知的、程度不等的人类种族分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从种族形态学方面首先记述和讨论这些资料。

第一节 中国境内发现的与蒙古人种起源有关的早晚期智人化石的研究

首先从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的研究提出中国境内现代智人种起源假设的是德国学者魏敦瑞(F. Weidenreich)。他在研究了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以后,提出了由周口店的猿人演化为蒙古人种的观点^[1]。后来,美国的孔恩(C. S. Coon)也持相似的看法^[2]。他们做这种推测的根据是,在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和牙齿上发现

有某些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可能存在遗传连续性的特征,如猿人的下颌骨其舌面出现下颌圆枕,耳道上存在异常骨疣(又叫耳圆枕),上门齿舌面呈铲形,颅骨额、顶部正中央有矢状脊及其两侧平凹的矢状旁凹,顶、枕骨之间出现镶嵌骨,颧骨颧面和额蝶突方向明显朝前方,圆钝的眶下缘,鼻额缝和额颌缝相连续的形状较近水平走向,肱骨上的三角肌粗隆非常粗壮,股骨矢状方向极为扁平等等。虽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这些特征仍然一直延续到包括现代华北人在内的蒙古人种之中。

但是,魏敦瑞认为从周口店发现的3具完整的山顶洞人头骨,则分别代表了很不相同的种族类型,即第101号老年男性头骨具有原始蒙古人种兼有西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罗巴人种特征,第102和第103号两具女性头骨则分别代表了太平洋岛屿中的美拉尼西亚人种和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现在一般改称因纽特)人种^[3]。这就是说,在华北的同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居民中,出现了三大人种因素的成分。他还认为这些山顶洞人不代表中国人的直裔祖先,他们是从外地迁移来、遭到当地土著居民的攻击而绝灭^[4]。受魏敦瑞的影响,中外学者有一度信从其说或作某种变相说法的,如胡顿(E. A. Hooton)的阿伊努人种说^[5],费尔塞维斯(W. A. Fairservis)的高加索人种说^[6]。中国学者李济持山顶洞人的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混合说,主张在远古的中国居民中存在大量的美拉尼西亚-澳大利亚人种成分^[7]。苏联学者切博克萨罗夫(НН. Чебоксаров)则认为山顶洞人有弱的人种分化性质而兼有明显的多形性,并已经能够从中发现一些时代更晚近的在东亚和南亚广泛分布的太平洋蒙古人种的特征^[8]。

应该指出,以上学者的各种观点,是在并未经过对山顶洞人化石资料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的。即使魏敦瑞本人对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也只是一个简报性质的报告。直到20世纪60年代,吴新智将山顶洞人的种属问题重新做了细微的核查和研究。他认为这3具山顶洞人头骨都具有共同的蒙古人种特征而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现代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比较接近,表明当时蒙古人种仍在形成之中,但还有一些形态细节尚未充分形成^[9]。赵一清则根据某些观察和测量数据的比较研究,也提出过两具山顶洞人女性头骨应属蒙古人种的看法^[10]。目前在国内对吴新智的研究还没有提出过异议,因而在引用山顶洞人种属问题时一般都沿用他的看法,把山顶洞人当作华北地区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

在中国南方发现而能够作种属研究的晚期智人中,当属在广西柳州通天岩发现的柳江人头骨化石。由于保存了除下颌外的几乎完整的头骨,可供详细的种族形态学的观察与测量,对研究中国华南晚更新世古代人的种族特征有重要的意义。据吴汝康的研究,柳江人头骨上有如下一些特征的组合:一种显示比现代人头骨原始的性质,如中颅略长的颅型,前囟点位置远比现代人靠后,上面低而宽,眶型宽矮,这些是世界各地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共有的特征。又根据头骨的形态特征,从测得的颅盖骨指数和前囟位指数、前囟角和额角大小等判断,认为柳江人为现代智人类型的早期代表(即指晚期智人的早期代表),比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和四川资阳人为原始。此外,柳江人头骨上还显示出一系列大人种性质:如头骨属中颅型,颧骨较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鼻棘很小,缺乏明显的犬齿窝,中等的上齿槽突颌,上门齿舌面仍可辨别有铲形等蒙古人种特征。因此认为,柳江人也是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11]。

对于柳江人头骨的种属地位,国内外学者也曾表示了某些不尽一致的看法。如美国的斯图尔特(T. D. Stewart)认为,在具有低的颅穹顶及眉脊、鼻和腭等形态特征上,柳江人头骨表现出“澳大利亚人种”特征^[12]。苏联学者雅基莫夫(В. Якимов)也认为柳江人头骨的一系列测量值决定它处于蒙古人种和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之间的过渡地位^[13]。切博克萨罗夫(НН. Чебоксаров)则认为柳江人头骨同蒙古人种的古代和现代南方地区类型特别接近。他在比较了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头骨之后推测,在中国南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存在头、面部尺寸更小,形态更纤细和阔鼻性质更明显的人种类型,与华北的类型有区别。因此推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太平洋蒙古人种可能有两个组群,即在地理和形态上向大陆蒙古人种过渡的东亚组群和连接蒙古人种同澳大利亚人种的南亚组群。他还认为柳江人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一种假设,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南方存在蒙古人种与澳大利亚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而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可能都是从人类原始居住地区东半部的最初的智人起源的。他还认为,对吴汝康提出的柳江人是在中国南方形成的蒙古人种最早代表的意见,只能有条件地接受,即不能说柳江人代表了所有蒙古人种的最早代表,而只能说代表蒙古人种的太平洋支系,这个支系中向澳大利亚人种过度的南方诸类型,的确可能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在东亚大陆地区的印度北部和中国南部范围内形成的^[14]。

中国学者中,对柳江人化石的研究作出某些评论的是颜闾。他在比较了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头骨的形态特征后,指出柳江人的形态发展更接近蒙古人种的某些南亚类型,柳江人和山顶洞人虽同属蒙古人种的形成阶段,但柳江人在形成阶段上较山顶洞人有进一步发展,如柳江人的眉弓与山顶洞人的比较不那么突出,头形变短,鼻根趋于低矮,额部倾斜程度减小,颧宽、额宽变短,这些特征都更接近现代蒙古人种。但柳江人的鼻根指数较低,接近于蒙古人种的下限,属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范围之内,垂直颅面指数也较低。以上的一些特征比较接近某些南亚蒙古人种。他还根据柳江人的颅盖骨指数比山顶洞人高,额倾斜度比山顶洞人小以及眉弓发达程度、颧弓大小和骨骼粗硕程度的比较,认为山顶洞人比柳江人还要原始一些^[15]。这个看法与吴汝康认为柳江人在形态发展阶段上比山顶洞人更原始的见解相悖。

由上可知,在人类学者中对柳江人的小种属倾向及其与山顶洞人相比的形态发展差异的解释上,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我们不妨承认柳江人头骨比山顶洞人具有更明显的倾向南亚蒙古人种的性质。如果这种判断可信,那么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形态差异可能说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晚期智人在各自形成蒙古人种体质特征的过程中,已经明显存在异形现象^[16]。

在中国发现的其他晚期智人化石虽还有多处,如四川的资阳人、广西的麒麟山人、内蒙的河套人、辽宁的建平人、云南的丽江人及台湾的左镇人等,但化石都十分零碎,有的还缺少可信的时代证据,系统分类也可能还有问题,因而对种属特点的研究意义不大。其中资阳人化石也仅保留了脑颅部分和一块上腭片,面部的其他部分残缺。虽然按习惯把它也列入晚期智人化石之中,但对它的小种属特征并不清楚。现在一般依然把资阳人作为在中国华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代表蒙古人种之一^[17]。也有人把资阳人列入中石器时代和太平洋蒙古人种的南亚组群^[18]。

由于最近新的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有关原始蒙古人种形成时间的讨论已经不限于晚